

论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

於贤德

(汕头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代表, 对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时, 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读、质疑, 他们的美学思想也存在着不少失误之处。文章主要通过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力图为我们新世纪的文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与借鉴。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文论建设; 启迪; 借鉴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225(2002)05-0001-009

法兰克福学派运用理论批判的武器, 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的工业社会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与批判。由于它的批判理论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等当今世界一些很有生命力的社会哲学思潮, 又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给予深刻的关注, 使这一学派成为 20 世纪国际思想领域中的佼佼者。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和文化理论跟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学派的主要成员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对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同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这一学派对马克思的美学观点存在一些隔膜和误读。对此, 国内外学者都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认真深入的研究, 本文想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在建构他们的批判理论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的分析, 讨论这一学派的贡献与失误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启迪与借鉴, 为中国在 21 世纪的文论建设呈现创造的多样性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20 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种种惊心动魄的变化: 日新月异的发明创造、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残酷的战争、经济的大萧条交结在一起, 人们在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和享受的同时, 又承受着多方面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田园牧歌式的农业社会被机器生产的流水线所取代, 作为精神自由创造的文学艺术却在大众传播的异军突起中变成可由机器大量复制的“文化工业”。面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法兰克福学派不是漠然处之, 而是以巨大的学术勇气和高度的理论敏感予以密切的关注, 并由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 2002-01-10

作者简介: 於贤德 (1950—), 男, 浙江宁波人, 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最终形成了面向现实生活的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在艺术文化学说方面正是建立在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密切关注的基础上,他们的批判理论把当代社会人类理性的强化、工业文明的崛起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病的根源——社会异化的根本因素来看待。他们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为现存制度辩护的“新的意识形态”,并由此提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及由“大众文化”所强化的“操纵意识”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和现代主义美学观,阿多诺寻求救赎之道的“救赎美学”,马尔库塞的“超越现实”的美学,弗洛姆的新精神分析美学,以及哈贝马斯由美学方法论着手建立的“批判阐释学”,并最终通向“交往合理化”的新美学。这些洋洋大观的美学理论,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对当代人类的艺术文化活动进行深层次探索的成果。当然,这些理论不可能穷尽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和艺术文化生活的认识,在他们的学说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法兰克福学派能够敏锐地发现现实生活向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新问题,能够以探索的态度去审视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并通过对那些不合理现象的分析批判,努力矫正生活中那些片面性的东西,使社会朝着更符合人的内在本性的方向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这种坚持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的学风,应该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这对于美学和艺术文化研究来说当然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以教条化和僵化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不敢对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各种艺术与文化方面的新事物、新现象,进行深刻的剖析和负责任的判断,只是简单地用马克思本人说过的那些话语和现成的结论去套那些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的现实问题,不但不可能比较科学地把握生活的脉搏,而且还会使科学的理论在教条化、僵化的过程中丧失它的生命力。正如刘放桐先生所指出的:“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1]法兰克福学派没有把马克思的美学观点当作经院哲学来阐释,而是力求从实际出发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一点应该值得充分肯定。

法兰克福学派在建构他们艺术文化和美学理论时,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人的重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依仗高额利润刺激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去压抑人的本性,扭曲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质受到极大的异化。如马尔库塞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是“人的本质的大灾变”,人的个体自身、人的个体的内心世界,在异化的现实中被扭曲、被压抑。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就是要通过他称之为“大变动”的“总体革命”,就是要把革命深入到人的本质的层次上,并把他的理论看成是推翻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强大动力。阿多诺则是无情地揭露了文化工业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控制、思想意识的操纵和经济上的剥夺,他说:“文化工业令人嘲笑地贯彻了粗陋的人格主义哲学家所反对的统一的的文化概念,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往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2](P123,135)如果说马尔库塞从社会对人性的压抑这一理论视角来关注人性,那么,阿多诺则是通过对文化工业的危害性的具体揭露,从人的精神生活应该有丰富多样、合乎人的个体需要的发展来关注人

性，两人批判的着力点不同，但同样把人性、人的本质的复归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而高高地标举着。另外，像弗洛姆的理论，则是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关注人的本质与异化，虽然他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所误读，但他的美学观和文艺理论则始终不渝地贯彻了人道主义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本质是一种现代的人道主义美学”^{[3](P7)}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国内学术界曾经有过一段谈“人”色变，对人性、人道主义讳莫如深的年代，因此，有必要对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学思想中体现出高度的人性自觉作些分析。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把人道主义、人性及对人的本质的关注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应该说是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的，也是完全可以作为人类文明的果实被无产阶级所继承的。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南，它本身就包含着“解放全人类”这一崇高理想，《共产党宣言》早就郑重宣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73)}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包括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如果简单地沿用革命斗争时期的思维方式，把人性、人权、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扔在一边，最终恰恰会对人民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文革”十年浩劫的历史早已证实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荒谬。

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在他们的美学研究中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应该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神实质的。他们对于人性的高度关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尽管在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具体理解上，该学派的学说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但他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研究，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学说能够积极整合精神分析、存在哲学，后期还包括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现代思想，使他们的批判理论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又显示出高度的开放性。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成果，都跟这一时代的社会存在有密切的关系，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的本质。这也正是任何一种思想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并得以传播的内在依据。法兰克福学派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一个思想体系的生命力与它的开放性的内在联系，积极整合当代有影响的理论学说，为自己的批判理论展现了一个开阔的视野，从多向度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批判，当然也就增加了批判的针对性和深刻性。可见，积极地整合其它学派的思想成果，无论是对于理论建树还是对于实践的指导，都是相当有益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大多比较重视，有的论者把弗洛伊德的理论看成是这一学派的美学学说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3](P9)}他们大都对精神分析学产生过兴趣，尽管在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上存在着各种分歧，在整合和吸收的过程中出现过前后矛盾的情景，但他们对这一理论的重视和关注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说布洛赫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阐述自己艺术观，认为艺术是对白日梦的完满改造，本雅明用弗洛伊德的意识有抑制兴奋的功能来解释所独创的“惊颤”这一审美范畴，还只是对精神分析学说的个别吸收，那么，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整合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自觉和系统的水平。专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学者马丁·杰伊在《法兰克福学派

史》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对精神分析的整合,而贯穿始终的则是弗洛姆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5](P102-13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通过调和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去建构新人道主义的美学体系,他坚持从社会历史环境去考察和界定人的本质,又运用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理论,尤其是潜意识层面的细致分析,去探讨人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并由此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人”的理论。弗洛姆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他对弗洛伊德的高度重视:

那种认为我放弃力比多理论就是放弃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一种只有从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立场才可能有的非常过分的说法。无论如何,我从未放弃过精神分析,……我的全部工作都是以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为基础,其心理玄学则除外。^{[5](P106)}

法兰克福学派善于吸收当代有影响的社会哲学学说来充实自己的美学体系,重视在整合他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理论创新,这跟他们的理论研究紧密关注社会现实、高扬人道主义旗帜一样,都是他们的批判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研究不但有这样几点值得我们借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美学理论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标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尽管学派的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他们都明确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地位。同时他们在主观上确实都想为焕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潜能,为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不断完善而尽力。虽然他们的努力未必都能如愿,但这样的态度,却仍然值得我们在建设新世纪文艺理论体系的伟大事业中予以高度的重视。

二

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学和艺术文化理论的研究中所显示出来的批判精神和理论上的创新意识,特别是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愿望,都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20世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学派所处的具体的学术环境的限制,使得这一学派在努力完善、发展马克思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误读,使得他们未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在学术上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一个显著的弱点就是他们在考察人类的艺术生产活动时,不够重视或者说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把握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学说的科学内容,不是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理解,从而导致了他们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简单化做法,尤其是马尔库塞等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新的意识形态”,混淆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与意识形态自身的规定性之间的界限,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由探究力这一人的本质力量不断提升所获得的社会进步,反而放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批判理论的针对性和战斗力,也使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性受到一定的损害。又如劳动在马克思著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在《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霍克海默却未能对这一问题给予正确的理解，甚至认为“使劳动成为人类活动的超越性范畴是苦行者的意识，由于社会主义者坚持这个一般概念，就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宣传员”^{[5](P69)}。本雅明和阿多诺也有这样的看法，前者认为强调劳动“只看到了控制自然的进步，而没有看到社会的退步”^{[5](P69)}；后者则认为“马克思思想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工场”^{[5](P69)}。霍克海默等人之所以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学说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解，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把握劳动在“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也没有认真领会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揭露，实质上就是在揭露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对工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的扼杀，指出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使劳动者真正占有人的本质。这些既不是“苦行者的意识”，也不是什么“劳动拜物教”，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未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导致的重大失误。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失误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重镇，法兰克福学派信奉马克思而又批评恩格斯、列宁，特别是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类批评包含着十分复杂的思想内容：既有该学派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的强烈不满，希望用他们的文化哲学、主体性哲学、主观革命辩证法，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文化批判，来实现他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又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读和曲解，特别是对列宁的贬责，导致他们在批评和否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时，错误地否定经过实践检验已被证明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这种情形，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活动中同样表现出来。

马尔库塞把艺术和审美看作是用幻想和想象去进入一个非压抑的世界，超越外在现实，又可以用无功利的自由的游戏，去排遣现实自我内心的忧愁，让人摆脱身心所受的压抑而走向自由，并由此回到席勒和康德那里，把艺术和审美看成是“无目的的目的”和“游戏冲动”。又如阿多诺在对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的否定和抨击中，把技术理性和启蒙的发展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根源，把意识、文化的操纵和控制看成是当代社会的主要危害，实际上却忽视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合乎人性的发展所造成的阻碍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失误，就在于他们把那些用教条化、僵化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所造成的错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固有的不足，从而在反对和批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时，产生了误读马克思、曲解恩格斯、贬责列宁的严重后果。

法兰克福学派本来是希望用激进的态度，更充分地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但由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还不是那么的深入和准确，未能划清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内涵的界限，又加上有时在从事自己的理论创新时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言论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把握，甚至提出“两个”马克思的说法，都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科学性和战斗性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他们在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错误。这是我们在讨论法兰克福学派时必须加以指出的。

三

刘纲纪先生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之一,并对它的基本性质、学术品格与历史地位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这种美学(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引者注)高度关注审美与艺术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种种新变化,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现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但是由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采取了否定或保留的态度,因此又渗入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在这种美学中,符合或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经常是杂然并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如此,它仍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对我们创造性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问题有若干借鉴作用。^[6]

这一分析应该说是中肯的、深刻的,也是符合辩证法精神的,因而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在建设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时更好地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避免重走他们所走过的那些弯路,创造出符合21世纪时代要求、能够真实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发展成果的文艺理论来。笔者认为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我们的关注:其中,批判精神、原创意识和学派力量可以成为有益的经验使我们吸收,而对现代科技成果的隔膜却应该作为教训而引起我们的警惕。

批判精神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战斗性的具体体现,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是马克思提出的改造世界的两个重要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在已经不可能运用“武器的批判”去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下,“批判的武器”自然成为他们的最好选择。值得肯定的是,他们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去展开理论研究,以鲜明的社会态度去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否定因素。这种政治方向上的自觉不但保证了批判的社会功能的实现,同时也使理论研究始终保持对于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因此,坚持学术研究中的批判精神是法兰克福学派学术生命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

批判精神不但需要政治和学术的勇气,同时还需要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对社会高度负责的人生态度。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吸收、整合那些有生命力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敢于对那些已经不适应现实生活的思想观点提出自己的挑战。他们在对现成理论的质疑、否定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采取批评和修正的错误,导致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批判理论之中,但这种失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坚持批判精神,而是批判精神的核心——对现实与理论的实事求是地分析——未能得到彻底贯彻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否定他们的批判精神,而应该把批判精神运用到理论研究中去。

所谓原创意识,就是把创新作为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原创精神可以说是作为学派的灵魂而受到不同时期学派成员的高度重视。马丁·杰伊在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详细摘录了研究所的学生O·斯威德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对当时的所长格吕堡的抱怨:“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倾听研究班和学生圈子中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争论,却没法听到一种声

音指出那一文不值的‘哲学’概念的分割游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5](P18)}并且指出：“斯威德对格吕堡时代没有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厌倦也为研究所后来的领导人所共有，正是他们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5](P18)}可见，反对用僵化的、教条主义式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创造性来指导理论研究，是法兰克福学派极为重要的学术品格。正是坚持这种原创意识，法兰克福学派才会通过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中的文化思想、审美与艺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的种种变化，才会提出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所具有的“否定”、“颠覆”、“超越”的功能这样一些新鲜的观点，才会对受现代科技影响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文化产业”的负面作用进行严厉的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弗洛姆，他们之所以在理论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建树，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理论研究中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如霍克海默，他反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倾向和他宣称的绝对真理，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形而上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也许是在某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形而上学体系或片断存在，但我知道形而上学家通常对人类的痛苦熟视无睹。”^{[5](P57)}可见，对于创造性的追求，确实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和获得成就的基本条件，这早已为一切有所为的学问家反复证实的真理，对于我们建设21世纪文艺理论的学术研究活动来说，仍然有着最基本的借鉴作用。

重视发挥学派的力量，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这里所说的学派力量，主要是指学术研究能够有意识地组织一批真正从事创造性研究的学者队伍，既能对一些重要的课题进行比较集中的关注，又能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有自由探讨的广阔天地。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美学、大众文化的批判中做出很一般的建树，尤其是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过那些单枪匹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学派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的集聚效应在起作用。

创造力的集聚效应是人类社会性的具体表现，它在人们的物质生产、科学实验与革命斗争中一般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在人的理论探索中常常为大师们的个体性行为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掩盖，好像在人文科学领域，个人的艰苦努力足以完成揭示一个又一个的精神奥秘的重任，一些伟大的学者就是在独自的冥思苦想中作出他们的建树的。其实，人文科学研究中充分发挥个人智慧的必要性与高度重视集体的力量并不矛盾。许多思想火花就是在相互切磋中闪现的，不少真知灼见也是在学者的汇集与研究活动的长期坚持中所呈现出来的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相交的聚合效应中产生的。韦尔父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捐赠的那个有16个小工作间、4个上百座位的研讨班教室、一个藏有7.5万本图书的图书馆的五层楼，特别是每年赞助12万马克的财政资助^{[5](P13)}，为学派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更为重要的事，思想独立、学术自由作为研究所的目标，在时间的推移中始终得到尊重。如果说对某些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的共同关注是学派存在的起点，那么，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思路去得出不同见解，恰恰就是学派之所以有其生命力的内在依据。法兰克福学派在学术研究的组织形式上表现出来的优势，对于我们建设富有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文艺理论，应该说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文科学工作者常常会以比较迟钝的反应、相对隔膜的态度来对待它。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现代传播媒介的批判表现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感看到。文学艺术在电影、广播电视

这些新鲜事物面前会显得“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首创的观点。黑格尔早就指出工业社会各种产品“大半是用机械的方式生产的”所导致的“每个人都失去它的独立自主性，……他的每种活动并不是活的，不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式，而是日渐采取一般常规的机械方式”^{[7](P331)}，对于艺术的审美创造肯定会制造许多障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得更明确：“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8]法兰克福学派把美学和艺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环节，而在具体的批判活动中却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强调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应通过审美作用，去实现巨大的“否定”、“颠覆”、“超越”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的观念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支配着一种非自然的、异化的、假的文化而不是真实的东西。这种矛盾其实是在坚持“审美的颠覆”，是在强调艺术的政治功能的实现必须依赖艺术的审美特性。应该指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资本对于文化的操纵所带来的种种危害，是有意义的，但对于科学技术新成就所支撑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的否定，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认为无线电之于法西斯正如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各种新技术在美国广泛服务于文化工业恰像它在欧洲帮助权威政府对民众的控制。法兰克福学派这些观点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把现代科技成果作为批判的对象，把现代传播技术视为否定性力量，结果就悖离了学派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初衷，即忽视或放弃了对于制度、意识形态层面的否定，批判矛头却指向了技术层面。二是他们只看到了技术对于审美的损害，没有注意到审美活动必须依靠技术的进步，设想如果没有冶炼技术，何来精美的铜像与青铜器，没有精致的手工艺，何来神奇的提琴、钢琴与铜管乐器。因此，技术也是推动审美创造的重要动力，现代光电技术所带给人类的摄影、电影、电视和电声艺术，同样开拓着艺术美的新领域。正是由于对于现代科技的隔膜，使得他们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时出现了偏差。这是我们在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时值得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就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贡献与失误进行简单的梳理之后，可以发现这一学派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了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迪和借鉴：他们能自觉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能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提出自己的理论，能够高扬人文精神，在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重视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本质，能用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当代社会哲学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能做到全面、准确地把握，误读甚至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失误，这些又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中，首先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紧密关注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审美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去研究社会现实，并发挥批判精神、原创意识，注意形成学派力量，并且更多地关注高新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革命对审美与艺术的种种影响，在理论上作出新的创造。

刘放桐先生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经说过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并无不可超越的矛盾，它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连萨特等一些著名的西

方哲学家也肯定它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它今后的发展不是走向另一种与之不同的哲学，而是通过更加紧密投入现实生活 and 实践，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克服偏离其本身的倾向，吸取新的经验，从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1]

我认为这个看法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及其当代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最好典范——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研究，遵循这一思路，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在新世纪里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定会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刘放桐. 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J]. 新华文摘, 2000, (3).
- [2] 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的辩证法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3] 朱立元.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导论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马丁·杰伊. 法兰克福学派史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6] 刘纲纪.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 [J]. 文艺研究, 2001, (1).
- [7] 黑格尔. 美学（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8] 杨柏.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 [M]. 文化艺术出版社.

The significance of Frankfurt school of sociology to the constructure of China's culturology

YU Xiande

(Liberal Arts College,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Frankfurt school, with its integration for the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full of vigor in contemporary world, has conduct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criticism on modern industrial world. Chief members of the school, as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 Marxist esthetic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Marxist esthetics, but with certain mistakes in their esthetic theories owing to their question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ir misinterpretation thereabout.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into the factors contributive to this phenomenon in an attempt to present some revelation and acquisition for the constructure of China's culturology.

Keywords Frankfurt school; revelation; acquisition

(责任编辑：翁奕波)